

范金民 胡阿祥 主编

江南地域文化的 历史演进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本书获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和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范金民 胡阿祥 主编

江南地域文化的 历史演进文集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范金民,胡阿祥主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

ISBN 978-7-108-04414-3

I. ①江… II. ①范…②胡… III. ①文化史—华东地区—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0121 号

责任编辑 麻俊生

封面设计 路 静

责任印制 李思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42.25

字 数 620 千字

定 价 110.00 元

目 录

地域文化篇

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	胡阿祥/3
关于江苏地域文化的几点思考	夏维中 韩文宁 丁 骏/20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吕宗力/37
民众运动所见唐末以前江南的地域社会与文化	葭森健介/69
千年图,八百主:王齐翰《勘书图》的流转	范金民/79
明代江南养生知识的生产与流传:以养生书的编写与出版为核心	陈秀芬/95
明清以来的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	马学强/116
明清江南人才与人口文化教育素质	吴建华/135
清代江南徽州典当商的经营文化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典当秘籍四种研究	王振忠/147
从苏州到上海:评弹与江南都市文化圈的变迁	唐力行/171
城市空间重构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	
——以清末民国南京为中心	陈蕴茜/192
1940年代末江苏省青浦县的地籍台账和地籍公布图	稻田清一/213

地域经济篇

由江南史前织机说到固定台式织机的出现	刘兴林/243
宋代江淮的漕运	李天石/253
明代以降江浙地区的藏冰业与冰鲜业	邱仲麟/276

感官世界的开发与欲望的商品化

- 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观察 王鸿泰/305

空间·网络·市镇经济

- 立足于江南地区商品市场网络的分析 张海英/329

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 邱澎生/349

清代长江下游水运交通与城镇兴衰大势

- 兼论扬州邵伯镇 刘石吉/369

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 马俊亚/381

长江三角洲地区中等金融城市货币资本的积累及其融通功能 马俊亚/404

地域社会篇

吴国历史的再思考

- 以近年来苏南春秋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线索 张学锋/421

论六朝建康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 佐川英治/433

论华谭

- 以两晋之际江东地域政局的走向为中心的考察 王永平/453

论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民阶层 陈国灿/473

江南人家以有无倪画别清浊

- 倪瓒与江南文人的理想人格 陈江/494

元末明初的日元航路

- 兼及新发掘僧传之介绍 榎本涉/509

明中后期南京士绅家族的社会形态 罗晓翔/531

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 蒋明宏/545

太阳的记忆

- 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诞辰话语的知识考古 孙江/555

明清以来江南妖术恐慌的衍变及其社会根源 徐茂明/577

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

- 以余治为中心 黄鸿山 王卫平 刘昶/598

金粟斋与《穆勒名学》的译刊 邹振环/616

清代末年江南出身官员社会构成浅析

- 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 伍跃/634

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 汪利平/653

后记 /673

地域文化篇

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在拙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附录1:六朝概念辨析与六朝文化研究”中,笔者认为,从比较与宏观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有如下时代特征:深层的分裂局面;复杂的民族关系;特殊的社会结构;变动的典章制度;频繁的人口迁移。按这些时代特征,往往又联系着“地域”。以言“深层的分裂局面”,正是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其实也是一种“分裂”。^①以言“复杂的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等等,复杂异常。以言“特殊的社会结构”,如所周知,治魏晋南北朝史,家族是关键之一,而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以言“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代诸多的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于是讨论魏晋南北朝制度,也就不可缺少地域的观照。以言“频繁的人口迁移”,若迁出地、迁入地、迁移路线及其对于相应地区的影响,更是直接、具体的地域问题。

其实不仅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中,“地域社会”的理解是基础与前提问题,中国历史其他时段的研究,也不例外。考虑及此,草拟“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为题,

① 值得指出的还有,哪怕在同一政权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地方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梳理近年来的思考,而成此文。^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意在叙述笔者的若干心得与想法,写得较为随意,算不上成熟的论文,因此希望诸位同仁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完善。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历史地理学者的思维

关于中国历史以及承载中国历史的地理空间,笔者觉得,最简明的表述是两句话:“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怎样的“上下五千年”?上下五千年连续的或者说不间断的文明史。连续,这是中国历史最精彩的地方。现代中国人谈孔子、读老子、说庄子还有感觉,这就是“连续”;现代中国人看甲骨文与金文基本还能认识,这就是“连续”。这种“连续”,在世界文明古国当中是非常特殊的。怎样的“纵横一万里”?广阔而且复杂的地理空间。没有这样的地理空间,当然就无法承载民族繁杂、人口众多的中国历史的创造者;没有这样的地理空间,也就没有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历史与民族文化。考虑到在生产水平低下时,地理环境的影响较之今天更加直接、全面、重要,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其中的地域历史,应当更加重视这样的地理空间。

在中国的历史学和地理学中,特别关注“地理空间”的分支学科是历史地理学。^②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的学科;历史地理学的“关键词”,可以认为是“复原”(各别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复原)、“变迁”(不同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分布”(特定时期自然地理要素与人文地理要素的分布)、“差异”(选定时期自然地理面貌与人文地理面貌在各别类型地域之间的差异)。在这四大关键词中,与本文的主题“地域视野”关系最为密切者,无疑是“差异”,因为“地域差异”正是“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能够成立与得以展开的基础与关键。以此,下文集中讨论既是历史地理学四大关键词之一,又对当今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影响甚巨的“地域差异”。

① 2007年10月17日,在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召开的“全州学国际学术大会”上,笔者作“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与南京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报告;2007年11月30日,在韩国首尔大学“东北亚历史地图编纂委员会第1回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作“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附及历史地图的编绘”报告。本文即据这两次报告删改。

② 在国务院学位申请学科分类中,历史地理学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中国史的7个二级学科(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之一;而中国地理学会下设专业委员会中,有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接受历史地理学的申请。

地域之间的差异,包括自然地理景观的差异、人文地理景观的差异。这些差异的现代状况,往往能够直接感受。以中国人文地理为例,在内地汉族地区,以秦岭、汉水(中游)、淮河为界,划分南方与北方。南北之间差异明显,如交通方面是南船北马,饮食方面是南米北面,军事方面是南方水军占优、北方骑兵擅胜,武术方面是南长于拳、北长于腿;再者,由于北方尤其是华北地形完整、平坦,而南方的地形相对破碎、间隔,使得在语言、饮食等等方面,北方在较大的地域里显得较为一致,而南方的方言、菜系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认为,北方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因此倾向“求同”,南方在这些方面则习惯“存异”;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长期以来,政治的“话语权”属于北方,所以中国历史追求“大一统”的趋势相当明显。

诸如上述的南北差异,也存在于中国内地以山(太行山)、河(晋陕黄河)、关(函谷关)、峡(三峡)等等大体划分的东部与西部之间。^① 南北差异的自然地理基础是纬度的不同,东西差异的自然地理基础则是海陆距离的远近。而以这样的南北差异与东西差异为基准,层层缩小来看,中国现在在各省区之间、省区内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城市内部,也都存在着种种的差异。以笔者现在生活的江苏省为例,就可划分出五个文化区,即龙盘虎踞、南北贯通、洋溢着浓厚进取精神的金陵文化区(南京、镇江范围),聪颖灵慧、细腻柔和而又视野开阔、富于创新的吴文化区(苏州、无锡、常州范围),清新优雅而又豪迈俊秀的维扬文化区(扬州、泰州范围),气势恢弘、尚武崇文、以英雄主义为主流的楚汉文化区(徐州、淮安、宿迁范围),以及活力四射、充满开放意识的海洋文化区(南通、盐城、连云港范围)。又笔者家乡所在的安徽省,淮河文化、桐城文化、徽州文化,蔚为安徽地域文化研究的三大重点,其分别指向的地域,则是淮河、长江分隔的皖北、皖中、皖南。当然,如若层层放大而言,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语言、饮食、宗教、信仰等等的差异,同样十分明显。^②

既然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理环境限制的现代是这样,那么深受地理环境影响

① 1999年以来政府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之“西部”,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这是以经济为指标的,与此所谓内地的“西部”不是同一概念。

② 谭其骧师《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古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

的古代更是如此。这里引述两例历史文献加以说明。例一，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条云：

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间，风尚顿异。自大中桥而东，历正阳、朝阳二门，迤北至太平门，复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桥，大内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丰而主啬，达官健吏，日夜驰骛于其间，广侈其气，故其小人多尴尬而傲僻。自大中桥而西，繇淮清桥达于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东至内桥、中正街而止，京兆赤县之所弹压也，百货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狙佞，千百嘈啖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兢。自东水关西达武定桥，转南门而西至饮虹、上浮二桥，复东折而江宁县，至三坊巷贡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競千金裘马之风，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于闾閻，膏唇耀首，仿而效之，至武定桥之东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笄桥而北，自治城转北门桥、鼓楼以东，包成贤街而南，至西华门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群萃，太学生徒之所州处也；其人文，主客颇相埒，而物力啬，可以娱乐耳目，臆慕之者，必徙而图南，非是则株守其处，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楼达三牌楼，络金川、仪凤、定淮三门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旷土；其人文，主与客并少，物力之在外者啬，民什三而军什七，服食之供粝与疏者，倍蓰于梁肉纨绮，言貌朴儉，城南人常举以相嘲哂，故其小人多悴猥而蹇陋。

由这段史料可知，距今约400年前的明朝南都（今江苏南京市），可以划分为皇城附近的政治区、秦淮两岸的官绅区、大中桥与水西门之间的商业区、城北的学校军卫区；它们虽在一城之内，而“民生其间，风尚顿异”。极可注意的是，这样的城市历史人文地理分区，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南京城市的功能分区与文化面貌，从而彰显出人文特征顽强的传承性。例二，清褚人获《坚瓠乙集》卷一“各省地讳”条云：

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爪，山东曰侏，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元时江南亦号腊鸡，福建曰癩，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务各以讳相嘲。

所谓“地讳”，可以理解为外省人对该省人特别的称呼，而这样的称呼，能够集中反映各别省区某些突出的人文地理特征。比如现代中国某些省区的集体“绰号”，江西老表、湖南蛮子、湖北九头鸟与四川的川蛮子、川油子、川耗子一类，若从历史传统与地域差异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相当程度地丰富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容。

如此，选择各具特色又彼此相关的“地域”，重视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政治区域或行政区域、经济类型、移民活动、城市辐射等因素入手，^①追寻各别地域形成的历史过程，观照其共同传统，解释地域之间的差异，研究不同地域的冲突与融合，是可以建立起区别于“狭义”历史学的、研究与解释中国历史的新体系的。如综合地理环境与社会文明两者，“历史中国”^②可以划分为六大地域社会，即大江大河孕育的文明之邦与内地农耕社会，绿草黄沙的牧人之家与蒙古高原牧业社会，林海雪原沼泽的天地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世界屋脊的神秘国度与青藏高原牧业社会，茫茫沙海中的绿岛与天山以南农耕社会，崇山峻岭分割的世界与云贵高原农耕社会；^③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正是这六大地域社会之间以及六大地域社会内部彼此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内地农耕社会、蒙古高原牧业社会、东北狩猎农耕社会言，五代十国以前，中国历史的一条主要线索是内地农耕社会与蒙古高原牧业社会的关系，长城是双方对抗的界限，长城南北是双方交战的主要地带，双方交战的经济解释是突破还是守住长城这条资源封锁线；^④五代十国以后，中国历史的一条主要线索则是内地农耕社会与东北狩猎农耕社会的关系，这与石敬瑭出让幽蓟十六州给契丹、从而一马平川的华北门户大开有关。再如天山以南地域社会，以串珠般的绿洲为生存的地理基础，国则不大，民则不众，兵则不多，加之彼此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而又

① 如这些因素与历史文化区域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卢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有所分析，可参阅。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指出：“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按这样的“历史中国”地域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另参考胡阿祥：《“中国”名号考述》，《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 参考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第1章第1节，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④ 关于长城作为“华夏帝国”资源封锁线的详细讨论，参考王明珂：《游牧者的选择——匈奴、鲜卑与西羌游牧社会及其与汉帝国的互动》，《中国古中世史研究》（韩国）第18辑，首尔：冠岳社，2007年。

宜农宜牧,所以成为内地农耕社会、蒙古高原牧业社会以及青藏高原牧业社会争夺的对象,这便决定了天山以南绿洲政权的政治命运,总是受人统治,而此三大地域社会的交接点“河西走廊”的重要性,也因此凸显了出来。换言之,如果着意于“绿洲政权”的政治地理与宗教地理研究,着意于“河西走廊”的历史或者历史地理研究,不把握这样的“绿洲政权”与“河西走廊”以外的地域、“绿洲政权”与“河西走廊”本身地域的特点与地位,就无法理解诸多的历史与地理现象。

总之,既拥有共同传统又保持各别特色的中国地域社会,是理解与研究悠久而曲折的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时间与空间正像历史研究的双翼,只重时间过程的历史研究是单向的、平面的,只重空间过程的历史研究是模糊的、无序的;只有兼重时间与空间,双翼齐展,才是系统、全面、立体的史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中国,专业致力于历史空间的研究者,是学科分类并不清楚的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学体系庞大,按其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领域,两大领域又各自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分支;而按照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体例形式,则可区别为通论历史地理、区域历史地理、部门历史地理、断代历史地理。虽然无论哪种体例形式,都以特定的地域为研究范围,但“区域历史地理学”是以区域的选定为前提的,与这里所谓“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关系最为密切。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区域,或为自然区,或为行政区,或为经济区,或为文化区,又或为多种区域的兼顾,也或为研究者出于研究的需要特别决定的区域;有时,历史地理研究的阶段甚至最终成果,就是为了划定区域。^①

① 如笔者在拙著《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讨论“历史文化区”问题时指出:行政区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尽管其划分有着自然环境的、经济状况的、民族与人口的多方面的基础与条件,因此与文化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但行政区毕竟不同于文化区。行政区尤其是一级大行政区,带有明显的人为特征,并根据政治、军事的需要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随时调整;文化区,则无论是特质文化区还是复合文化区,总是遵循着人类文化的地域分异规律,呈现出一种客观的发展过程,其变化也是渐变而非突变。如此,行政区(相对主观)与文化区(相对客观)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地理区域;对历史上文化区的研究,要求在尽可能客观地复原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异状况的前提下,合理地进行分区。依据这样的思路,笔者以魏晋文学及其历史背景——先秦两汉文学的具体情形与分布特征为依据,综合运用了自然地理原则、经济类型原则、行政区划原则等地理区划原则,将魏晋本土文学划分为河淮、河北、河东、关陇、河西、巴蜀、江东、辽东、南土、淮南计十个大区,并逐个进行地域性研究,得出了“无论是魏晋两百余年间,还是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具体的时期,河淮、江东都是本土文学最为发达的地区,河东、关陇也表现不弱,河北、巴蜀的起伏较大,河西则由野而文,又辽东、淮南及江东以外的广大南土,本土文学尚处于落后状态”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有利于建立起研究者对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的宏观认识。

在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方面,例举一些现代重要学者及其研究领域如下:谭其骧的上海研究,史念海、谭其骧、朱士光的黄土高原与黄河研究,侯仁之、景爱的北方沙漠研究,张修桂的洞庭湖、鄱阳湖研究,石泉的荆楚研究,张博泉、孙进己、冯季昌的东北研究,方国瑜、尤中、蓝勇的西南研究,陈得芝、周清澍的蒙古地区研究,徐俊鸣的岭南研究,苏北海的西域研究,陈桥驿的宁绍研究,于希贤的滇池研究,邹逸麟的黄淮海平原研究,侯甬坚的鄂尔多斯高原研究,鲁西奇的汉水流域研究,李并成的河西走廊研究,徐少华的先秦南土研究,张国雄的明清两湖研究,郭声波的四川农业研究,张伟然的湖南、湖北文化研究,张晓红的陕西文化研究,林拓的福建文化研究,吴松弟的东南港口研究,侯仁之、尹钧科、韩光辉的北京研究,王振忠的徽州研究,等等。

总之,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区域历史地理也不例外。从历史地理学科资源来说,中国拥有提供历史地理“复原”与“变迁”研究的“上下五千年”的时间资源,拥有提供历史地理“分布”与“差异”研究的“纵横一万里”的空间资源,拥有开展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各分支研究的数量巨大、类别众多、连续性强、分布普遍的文献资源,^①拥有自古至今关注、研究、记载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变迁的学术积累,^②而且由于历史地理学科较强的经世致用功能,^③得到各级

① 以言数量巨大,仅《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收书500多部,8000余卷;以言类别众多,《四库全书》地理类分为10目,即宫殿簿、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水、古迹、杂记、游记、外记;以言连续性强,如正史地理志、宋元明清民国迄今的地方志;以言分布普遍,到了清朝,地理书所及地区已遍及全域。

② 如由中国政治史上与天(自然)人(社会)感应相联系的极为重要的灾异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于是中国史书、地志重视记载祥瑞灾异;由《礼记·王制》“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的认识,中国颇多直接记载社会文化、风俗民情之人文地理材料,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九州风俗,《通典·州郡典》九州风俗,《宋史·地理志》十二区风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明清《一统志》风俗门,其他如(明)王士性《广志绎》、(明)谢肇淛《五杂俎》、(明)丘浚《大学衍义补》等等。

③ 蓝勇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导言”指出: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中国史的7个二级学科中,历史地理是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学科。如历史地貌、历史水文地理研究,可为现实的江河湖泊治理、防沙固沙、水土流失治理、地震预测和滑坡防治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气候地理和历史生物地理研究,可为经济建设中气候的中长期预报、现代生物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制定、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经济区域类型和区域重心演变、交通路线的择定、城市分布变迁、历史地名研究,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有着具体而直接的借鉴意义;至于社会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环境起始因素研究、复原过去的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与演变规律,也对现代文化建设具有较大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政府重视,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中,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相当迅速。

二、中国历史研究的地域视野:历史学者的立场

另一方面值得讨论的,是当今中国历史学越来越重视“地域”研究。本来,在古代学科分类中,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沿革地理学(也称舆地学)就是史学的辅助学科,如从隋唐到明清长期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分类中,沿革地理属于史部。沿革地理主要关注疆域变迁、政区沿革、地名定位、河湖演变,藉此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提供空间定位与地理解释。进而言之,人类历史时期的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关注空间的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学中的作用在于:研究不同时代社会发展所处的具体地理条件,阐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所处的地理场所,赋予历史过程以空间位置,明确历史事件的地理特征。如果设个比喻,中国历史好像一场多幕大戏,则改朝换代、分裂统一等等,是这场大戏一幕一幕的主旋律与主剧情;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到民族到民族群,是出演这场大戏的演员;黄河、长江、瓷、丝、长城、运河,《十三经》、《二十二子》、《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三字经》、《增广贤文》、《百家姓》,周公、孔子、朱熹、关公、诸葛亮,佛、菩萨、玉皇大帝、妈祖、财神,龙凤狮麟、琴棋书画、松竹梅兰,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算命看相、风水太极,“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等等,是戏中具有象征作用与符号意义的道具;史书、地志等文献,记述了戏里的台词。那么,地理空间或者说各别地域,就是中国历史这场多幕大戏演出的“舞台”。如1934年3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期之《发刊词》即强调: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科学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的人是无由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而已。自然地理有变迁,政治区划也有变迁。如果不明白这些变迁,就到处都成了“张冠李戴”的笑柄。^①

^① 此《发刊词》由谭其骧师起草,顾颉刚先生改定。

又1944年3月,《求是月刊》创刊号所载李长傅先生《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也指出:

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①

如此,要想看懂、听懂乃至融入中国历史这场多幕大戏,失去对古今变迁频繁、地域差异明显的“舞台”的亲经、感受、理解,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缺乏了对“地理”的历史变迁的认识,依据当今的地理环境去论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问题,则或下笔辄误,或不着边际。^②

抑有进者,有时人类“历史”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或者也未尝不是自然“地理”的问题。这里不妨引证祖籍安徽旌德的美国史家汪荣祖《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③文中的观点。在汪荣祖先生看来,朱明其实亡于民变,民变直接缘于饥饿,饥饿因为特异的灾荒,特异的灾荒根源于异常的寒冷气候,异常寒冷气候联系着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换言之,太阳活动周期的变化导致了地球气候变化,地球气候变化“既直接影响至生态环境,如果略为持久,必然危及人文景观,诸如生存条件、经济活动、甚至发生社会之动乱与夫政治结构之崩溃”,而“明清代兴之深层原因”,亦即十六七世纪之“小冰期”。作为结论,汪先生指出:

历史知识有“长时”、“中时”、“短时”之分。“短时”者,民变蜂起、崇祯自缢之属;“中时”者,连年饥馑、民不聊生之属;“长时”者,乃气候变化之属。此短、中、长时之分,就结构而言,各为外层之知、中层之知、内层之知。明清代兴

① 李长傅:《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求是月刊》创刊号,1944年3月。

② 如由今天的黄河流域自然地理环境,得不出古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达的结论;由今天的崤山函关形势,无法理解秦国与关东六国对抗时据有的地理优势;由今天的淮河状况,会迷惑于“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民谚;由今天的秦淮河、长江、南京城、石头城的相对位置,将不能解释六朝时代石头城对于京都建康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

③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就其短时之外层现象观之,不外甲申之变、清师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此读史者较易触见者,而欲洞悉史事之深层结构,则其事较难……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①

然则由这样的“结论”出发,苛刻些说,有些历史研究,还大体局限在“短时”的“外层之知”与“中时”的“中层之知”之阶段,至于兼及“长时”的“内层之知”,则尚待努力。

“地理”之于“历史”的重要性,据上讨论,应该无疑。大概正是导源于此,在中国,除了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外,其他历史学者关心“地理”的历史变迁者,既不乏人;而研究历史的空间分异状况或者地域的时间形成过程者,更是较多。尤其后者,可以认为做出了值得称赞的研究成果。以下试举两例,以窥一斑。

例一,汉唐地域史研究及其思考。

在中国,近十几年来,历史学界最关心地域研究的是一批研究明清与近代社会史的学者,其中形成较完整队伍的大学,有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就其研究方法言,尤重田野调查,并通过田野调查,读懂文献,形象而出于玩笑口吻的说法是“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其重点研究地域,是颇具特色、保存历史或者延续传统相对完整的福建、江西、湖南、四川、山西等省的若干县、乡镇、村;而其学术趋向,一是力图勾画地域社会的整体状貌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演化,即全局的、系统的整体地域社会史,二是运用“宗族”、“神庙系统”、“市场体系”、“水利系统”等分析工具,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不同视角,探讨“国家”与“社会”

① 其实这样的观点,本属诸多历史地理学者的通识。蓝勇编著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历史地理学》第 1 章第 5 节写道:“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迁往往是以这些地区的寒冷气候为潜在动力,故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高潮对应着千年尺度的寒冷期,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 100 至 500 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 1100 至 1200 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满清民族南下,正对应着‘明清宇宙时期’。通过对历史地理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有次序的事件对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和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往往是由于寒冷气候而带来的基本生存和生产受到严重威胁为潜在压力的。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战乱对北方地区经济的极大破坏,极大地分散了统治者的治国精力,而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我国北方汉族地区也同样经历了周期性寒冷气候的冲击,北方汉族地区的农业生态也受到极大的破坏,使中国北方从经济上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经济力量,穷于应付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经济的越来越困难,也更加重了内乱,戎马蹂躏,更使北方汉族地区经济衰落。”